

摘要：研究对 277 个地级市在 2011—2019 年间的信用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1) 城市的信用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但仅在东部地区信用对经济具有较高的拉动作用，其他地区主要依靠经济推动信用发展；(2) 从全国范围来看，信用—经济的耦合程度保持在初级协调水平，东部的协调程度相对更高，处于中级协调水平；(3) 信用—经济耦合协调程度高并不能说明两个系统均衡发展。东部双系统均发展良好，中部地区的城市大多是信用领先经济，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经济与信用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失调数量不断增加。最后，文章就如何实现信用和经济的均衡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信用环境 经济增长 空间联立方程 耦合协调度 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2)05-007-03

一、研究背景

信用是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间所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道德基础的一种信任关系(李慧材，2006)^[1]。社会信用体系是通过建设相对完善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共享和评价机制，赋能政府治理和日常监管，探索惠民便企的产品和场景的一系列机制的集合(陈新年，2017)^{[2][3]}。经过数十年努力，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环境、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

● 曾光辉 冯星宇

框架已逐步建立、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信用服务行业发展初具规模，信用体系建设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郭文波等，2021)^[4]。

信用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信用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经济运行、管理制度的核心要素(吴晶妹和林钧跃，2015)^[5]。吴晶妹等(2021)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步入信用经济时代，信用要素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枢，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公平、高效、畅通至关重要^[6]。郭文波等(2021)指出信用与经济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由于我国经济已基本告别了大规模、低成本的扩张模式，需要转向通过提升软环境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即经济对信用体系建设方向具有指引作用^[4]。

目前的实证研究更关注信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少从经济发展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这一视角展开。此外，已有研究大多未考虑样本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如崔萌等，2021；关伟等，2021)^{[6][7][12]}。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现有实证研究大多选取单向回归方程，难以捕

捉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和双向传导机制，也未能很好解决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将空间因素纳入信用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中，借鉴 Yang 和 Lee(2017)的研究，构建可控制内生性与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联立方程，进一步厘清信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8]。

二、文献综述

学者们已经证实信用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形成良好市场竞争氛围、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作用。吴晶妹等人(2020)分析了信用要素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机制，指出信用要素使金融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范围更大，具有更多的惠及群体，助力经济发展更为公平^[7]；钱水土等人(2020)通过研究信用信息平台搭建对中小企业融资贷款的影响，发现信用环境改善能够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9]；余永泽等(2019)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后认为，信用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推动经济增长^[10]。此外，信用通过发挥金融要素的作用保障现代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破解中小企业

邓靖：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环境下，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

一是提升合作机制的协作水平。加强高层统筹。结合“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针对补齐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短板，创新投融资模式、建立国际区域合作机制、提升通道运行效率，研究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强化协商互助。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与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互动，对陆海新通道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共识，共同推进，协商解决问题。

二是增强运营平台的协调力度。优化竞合关系。探索建立以股权合作、联盟为主要方式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区域运营平台公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开发区域市场。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的资源共享，探索共建运输单元、运输工具、仓储、货代、信息等方面的共享机制，打造进出口贸易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

三是构建水平更高的开放机制。拓展国际合作范围。鉴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的主要国际市场是东盟经济体，建议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委、海关总署等部委牵头，与东盟十国相关国家部委建立共同参与打造陆海新通道的联动机制，形成货源组织、运输航线、通关便利等方面的常态化合作。

四是创建高效的通道运行机制。提高基础设施供给质量。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部际和省际协商机制，加快推进渝贵高铁、涪柳铁路等“补短板”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启动项目建设。推动通道沿线高速公路加宽改造，给予资金支持，健全多式联运标准体系。

五是完善精准有效的保障机制。创新通道政策机制。建立通道协商定价机制，针对不同国家、线路以及主要运输货品等，共同研究制定统一的市场销售价格，建立定价协商联盟，避免恶性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秩序。创新通道金融互通政策机制。探索跨境多边保险交易市场服务，建设区域性物流保险及交易平台。

记者：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意味着重庆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助于中国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探索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重庆社科院研究员邓靖阐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具体实践、问题以及对策建议。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环境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亟待补齐短板、创新推动、发挥优长、借鉴经验，建立更广泛、更高效、更开放、更有序的省际合作、国际合作，带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责编：玉山)

融资难等问题,促进产业发展。总体上,良好的信用环境一方面降低了社会资源闲置水平,也加快了资源从低效到高效的流动。最后,郭文波等(2021)指出,完善社会信用结构能提升市场主体的契约遵从度,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动能^[4];宋立义(2019)认为,高效的信用监管体系有助于整治和预防失信违法行为,维护主体创新知识产权,形成规范有序的竞争格局^[11]。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近年通过商事制度改革引导市场主体形成良好守信守法氛围,通过“放管服”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等目标,对信用体系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崔萌等人(2021)指出,功能主义解释了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动因,例如经济水平提高增强了企业的用信需求,较高的外商投资需建立在完备的信用交易规则上^[12];宋立义(2019)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发展^[11]。产出的可持续性、产品增长的持续动力、市场运行效率高对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高效的信用监管体系有助于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维护主体创新知识产权,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有助于实现投融资需求的精准匹配,同时为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最后,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后如何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仍是一大难题。形成以信用等级为基础的监管机制,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建立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将有助于丰富政府部门的治理手段^[11];吴晶妹等人(2021)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而社会信用体系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是培育优秀市场主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7]。

综合上述观点,结合吴晶妹等人(2021)提出的广义信用观点,完善政务、商务、社会、司法信用体系,能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拓展市场主体的可支配资源,使其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权^[7]。同时,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对信用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例如,市场主体活力的释放需要减少政企间信息不对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等,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务诚信建设,行政部门之间、行政部门与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信息要实现互通,就需要依托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完善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做好数据安全保障。本研究认为,信用环境

促进了经济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又推动了信用体系的建设,二者存在相互耦合和协调发展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过程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传统的空间杜宾模型不能用以衡量变量之间的双向交互影响,本研究采用空间联立方程估计变量的重要程度与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内生性的干扰(邹新月和王旺,2021)^[13]。因此,建立如下方程:

$$\begin{aligned} \text{Credit} &= \alpha + \beta_1 \text{ECO}_{it} + \gamma_1 \sum w_{ij} \text{ECO}_{it} + \gamma_2 \sum w_{ij} \text{Credit}_{it} + \beta_2 \sum X_{it} + \mu + \varepsilon \\ \text{ECO}_{it} &= \alpha + \lambda_1 \text{Credit}_{it} + \gamma_3 \sum w_{ij} \text{Credit}_{it} + \lambda_2 \sum X_{it} + \varphi + \omega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ECO表示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每个城市的人均GDP测算;Credit表示信用水平,采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制的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测算。 w_{ij} 表示各样本之间的空间关系,参考郭文波等人(2021)的做法,本研究采用一阶Queen邻接矩阵^[4]。 X_{it} 与 Z_{it} 表示两个方程中的控制变量, μ 和 φ 为个体效应。 ε 和 ω 为误差项,在信用方程中包括金融行业发展水平(LOAN)、科教人员数量(HT)、信息化水平(INFO),分别由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全市GDP的比^[14]、全市从事科技研发等行业的人员数量^[16]、全市互联网与移动电话接入数测量^[17];经济方程中包括市场化程度(MAR)、要素禀赋水平(ENDOW)和产业结构(STR),分别由出口额与全市GDP的比^[1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资本)与全市从业人员(劳动)的比^[4]和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产值比求得^[20]。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次样本共覆盖277个地级市,观测期为2011—2019年。

(二)模型初步检验

首先,对数据进行LLC平稳性检验,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协整检验的结果中仅Ga拒绝了原假设,但Westerlund(2008)认为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接受的,即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18]。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经济增长对信用水平、信用水平对经济增长的F值在1%的显著下拒绝原假设,故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核心变量的莫兰指数显著也均

为正,说明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最后,进行共线性关系检验和相关性,发现VIF值均小于6,表示问题并不严重。

(三)全样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参考王立新和刘松柏(2017)、李逸飞等(2017)的做法,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最小二乘法(GS3SLS)估计研究方程^{[19][20]},并通过采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方式进行比较证实模型的稳健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空间联立方程结果

变量/权重	经济增长方程			信用水平方程		
	一阶Queen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一阶Queen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CREDIT	0.579** (0.031)	0.773** (0.034)	0.733** (0.036)	/	/	/
ECO	/	/	/	0.259** (0.029)	0.402** (0.023)	0.344** (0.027)
W_CREDIT	-0.495** (0.061)	-0.070** (0.003)	0.120** (0.036)	0.170** (0.050)	0.034** (0.002)	0.044** (0.009)
W_ECO	0.069** (0.036)	0.040** (0.002)	0.074** (0.005)	0.033 (0.042)	-0.010** (0.015)	-0.034** (0.004)
HT	/	/	/	0.342** (0.025)	0.336** (0.024)	0.374** (0.027)
INFO	/	/	/	0.415** (0.001)	0.476** (0.001)	0.597** (0.005)
LOAN	/	/	/	0.346** (0.026)	0.200** (0.022)	0.207** (0.024)
MAR	0.048** (0.010)	0.085** (0.020)	0.067** (0.021)	/	/	/
ENDOW	0.060** (0.017)	0.103** (0.018)	0.124** (0.019)	/	/	/
STR	-0.200** (0.018)	-0.181** (0.019)	-0.349** (0.020)	/	/	/

由表1可知,在不同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系数方向及大小都较为接近,表示模型的稳健性较好。在经济增长方程中信用水平的估计系数为正,表示本市信用水平每提升1%,经济水平能够提升0.58%,但信用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表示临近地区信用水平提升1%,将会降低本市0.49%的经济水平。同时,在信用水平方程中,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为正,表示经济提高1%,能改善0.26%的信用水平。经济增长滞后项系数在地理反距离和经济距离权重下均显著负向影响信用水平,表示临近城市经济增长会带来本市约20%左右的信用水平降低。

综合来说,从全国范围来看,信用与经济确实存在双向促进作用,但信用的弹性系数更大。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比信用更大,对周边城市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更明显。但是,经济对信用的空间回流效应要小于信用对经济的空间回流效应,也间接说明了信用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四)扩展性检验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信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上呈现不均衡特征。本研究将样本城市归到中部、东部、西部和东北部检验模型是否在区域上存在异质性,发现:(1)经济与信用在四个区域均有双向促进的关系,但东北和西部的信用水平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更大,东部的经济水平对信用的影响程度更大。在东部地区,信用促进经济

发展、经济推动信用建设的程度接近且系数均大于 0.5 (分别为 $\beta = 0.512$ $p < 0.05$ $\beta = 0.609$ $p < 0.05$)。其他三个区域依靠经济发展拉动信用体系建设的能力较弱。(2)从空间滞后项的结果来看,虽然高信用水平的城市对临近城市的信用也具有溢出效应,但对东部城市的溢出效应最小,对其他三个区域均较大,说明信用领先的城市对这三个区域的示范作用更大(尤其是东北 $\beta = 0.750$ $p < 0.05$)。(3)东部区域内的城市的经济和信用都更容易受到临近城市经济水平的影响(分别为 $\beta = 0.916$ $p < 0.05$ $\beta = -0.432$ $p < 0.05$)。(4)城市信用水平提升会抑制临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东部地区城市受到的影响最小($\beta = -0.247$ $p < 0.05$)。综合起来,虽然全国各地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大多数地区还是依靠提升信用水平提高经济实力,信用体系建设既可能受到临近城市的促进和制约,也可能受到本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对信用、信用对经济的弹性接近,是唯一一个依靠经济发展需要提升信用建设水平的地区,因此更可能受经济方面的因素影响。

(五)时空格局分析

1. 全国总体情况分析。上文的计量结果证实了信用与经济存在相互作用,研究采用如下公式测算二者的协调程度。其中 D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区间为 [0,1],越高说明协调程度越高。根据上文可以认为信用与经济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步发展,故令 $a=b=1/2$ 。结果参考王建康和韩倩(2021)的研究进行类型划分^[21]。

$$c = \frac{\sqrt{\text{Credit} \cdot \text{ECO}}}{\text{Credit} + \text{ECO}} \quad (3)$$

$$D = \sqrt{c \cdot t} \quad (4)$$

$$t = a \cdot \text{Credit} + b \cdot \text{ECO} \quad (5)$$

通过测算,研究发现总体上全国信用—经济的耦合协调指数在 0.6 左右,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的协调指数始终在 0.7 左右,处于中级协调;中西部地区协调程度与全国情况较为接近,处于 0.6 左右的初级协调水平;东北地区的协调程度在观测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期末时已经濒临失调。

2. 各区域情况分析。高水平的经济—信用耦合协调需要两个系统步调一致发展,因此及时找到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至关重要。研究将各个系统与当年的均值进行比较后参考王建康和韩倩(2021)的做法进行分类^[21],得到结论:

在东部地区,信用—经济发展失调的城市数量最少,协调发展的城市数量

在逐渐增加。经济滞后(信用领先)型的城市数量经历了两次波动,且在 2019 年呈现第三次波动的趋势。从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入选名单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先行先试,探索出了一系列新颖的做法。然而,这些先进经验对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滞后,但信用超前时经济水平会“随后跟上”,当经济超前时信用会“随后跟上”。2018 年后,东部的经济与信用“竞相追逐”关系已经平缓,单系统滞后的城市数量已经趋于稳定,双系统呈现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 2011—2019 年间,中部地区失调型的城市数量减少,协调发展的城市数增加,但幅度均较小。单系统滞后的城市数量在波动中逐年增加,但主要是信用领先型的城市数量增长较快,表示有可能中部的城市存在“模仿效应”,即采取了与其经济水平不相适应的信用提升方案,落实成效显著但未对本地经济增长起较强的助推作用。

西部与东北部的信用—经济的发展趋势较为接近。西部地区单系统领先的城市数量在减少(信用领先型数量在波动中下降,经济领先型数量在平稳中下降)。西部始终具有较多的失调型城市。同时,西部的协调型城市数量虽然变化幅度不大,但在观测期末时已经被中部地区赶超。综合起来,研究认为西部地区信用和经济建设发展动力不足易被其他地区赶超。东北地区单系统领先和双系统领先的城市都在减少,经济领先型的城市数减少幅度更大。在 2015 年后,协调型城市的数量保持在低水平,发展失调的城市数量呈现高速增长,表示该地区经济、信用全方面处于落后。

四、全文总结

通过对信用—经济的耦合关系展开检验,并探讨两个系统在全国、各地区的互动状况,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信用与经济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2)信用与经济对临近地区具有溢出效应;(3)从全国范围来看,信用—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保持在初级协调水平。东部处于中级协调,中西部处于初级协调,但东北在观测期末近乎失调;(4)信用—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不能说明两个系统均良好发展。东北在部分年限存在经济领先型城市,而中部具有较多的信用领先型城市。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各区域加快信用—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步伐具有一定启示。首先,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其信用水平受到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大,故其未来的信用体系建设应紧密结合经济

的实际需要,以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首要目标,升级优化信用信息平台,创新性地开发信用应用场景与“信易+”产品,尤其是推动“信易贷”服务中小企业融资^[22],使信用发展的步伐与经济增长的步调相一致,并对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其次,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其信用“超前”的城市数量较多,故应对原有的信用体系建设路径进行研判和调整,使其更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来说,由于其信用建设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善其经济水平,因此应推动已有的信用相关政策落到实处,推动信用要素切实发挥有效的中坚作用,保证经济发展更加畅通有效^[7]。另外,应及时对标全国信用—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城市,提高自身信用水平。通过模仿学习等方式寻求自身信用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加快对信息化产业、科教人员的培育力度,加快更多失调型城市转化为单系统领先型,进而通过培育信用—经济的协调互动实现“后来居上”。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大数据情境下的国家级平台及金融信用创新应用研究(基金号:92146005)]

参考文献:

- [1] 余泳泽,郭梦华,郭欣.社会信用的经济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J].宏观质量研究,2019,7(04):80-95.
- [2] 王旺,邹新月.地方政府竞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回归和空间计量的实证检验[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37(02):58-69.
- [3] 梁榜,张建华.对外经济开放、金融市场发展与制造业结构优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4):89-101.
- [3] 姬志恒,张鹏.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差异及驱动机制——基于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20,34(08):72-79.
- [4] 王婧,杜广杰.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41(12):11-27.
-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0)
- [作者简介:曾光辉,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20 级经济学博士生,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院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社会信用体系、区域经济;冯星宇,厦门国信信用大数据创新研究院经济师,研究方向:政务诚信。]

(责编:若佳)